

从农民助理农艺师、农民农艺师到高级农艺师、正高级农艺师，各地近年来大力探索开展的农民职称评定，正让越来越多的“泥腿子”变身“新农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技术保障。

“出圈”的“土专家”

本报记者 奚冬琪 张文敬 雷蕾



刘学亮（左一）在济南市章丘区辛丰村早熟苹果基地，向果农们讲解苹果冬剪技术。

近日，人社部官网发布消息，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永飞家庭农场负责人李永平凭借过硬理论知识和丰富生产实践经验，通过了石家庄市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与鹿泉区鹿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于江一起，成为全市最先取得初级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消息一出，人们纷纷叫好，认为评职称是对农民的认可和激励。

其实，农民评职称并非新鲜事。早在2017年7月，浙江省就提出打破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制约，将新型职业农民纳入农业系列职称的评审范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各地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试点。此后，山东、甘肃、宁夏、湖北、广东等地陆续开展了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此次农民评职称再次成为新闻热点，也引发了社会关于农民职业发展路径的思考和讨论。

有技术的农民就是土地里真正的专家

11月6日，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白云湖街道辛丰村丰源苹果园里，年届50岁的济南市章丘区政协委员、丰源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学亮，正在进行果树的冬季管理——修剪枝叶。“春梢长，秋梢短，中庸健壮好丰产；秋梢长，春梢短，来年仍然是光杆。”刘学亮一边操作一边说，冬季管理不单纯是修剪的问题，这其中的门道多、学问大，靠的不是书本而是经验。

“嘎啦果树的修剪四季都可以，但冬剪最重要。修剪时机上，最好是避开寒冷的时候，天天冷剪口易受冻害。另外，树不见光不结果，枝不见光不长粗，所以在修剪中要特别注意调节光照。”说起果树种植，刘学亮总能侃侃而谈。他说，这些经验都是长年累月待在果园里总结出来的。

已经种了22年嘎啦苹果的刘学亮是这个行业名副其实的专家，不仅获得了诸多荣誉，而且手握一项“硬指标”——2020年，他通过了2019年度济南市新型职业农民中级职称评委会评审，成了一名农民农艺师。

在山东，最早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审的是东营市。2018年10月，东营印发了《东营市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试点工作方案》并正式实施，先行开展初级、中级职称评定，名称分别为农民助理农艺师、农民农艺师。2019年，又开展了副高级、高级职称评定，名称为高级农艺师、正高级农艺师。在东营市试点两年后，山东省全面推开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制度。截至2021年1月，全省已有2224名新型职业农民通过评审取得职称，其中高级41人、中级626人、初级1557人。刘学亮就是其中的一位。

说起如何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成为拥有中级职称的“新农人”，刘学亮坦言，靠的就是自己不断的努力和国家的好政策。

2010年，刘学亮牵头发起成立丰源苹果专业合作社，以辛丰村为中心，辐射周边十几个村庄，带动周边村民新种植苹果1000多亩，产值700余万元。“苹果越种越好，我也得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才能跟上新发展。”刘学亮说，从2015年开始，他先后参加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经营管理班、农作物植保员培训、山东省新型农民创业培训、农科院乡村人才培训等培训班。“后来了解到国家有职业农民评职称的政策，2019年就参加了中级职称

培训，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结果还真评上了。”

对于自己的种植技术，刘学亮一向信心十足。用他的话来说，有技术的农民就是土地里真正的专家。拥有职称既是对职业农民的肯定和认可，同时也提高了农业技术人员的“含金量”。“评上职称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服务果农的时候底气更足了！我还想着再努努力，争取晋升高级职称！”刘学亮说。

不仅是刘学亮，很多评上职称的农民都感觉更受重视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信心也更足了。刚刚拿到初级职称的石家庄农民于江在接受上游新闻和极目新闻采访时说，自从评上职称的消息出来后，周边很多朋友都来关心他，询问他日后有什么打算，他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但他相信，自己会将这份压力转变为动力。“必须干好。”于江说，获评职称后，区里对他的支持特别大。自己目前初步打算要扩大生产，区里已经开始给他协调土地的问题了。另外，于江也说，他不会在拿到初级职称后就就此止步，未来，他仍将继续参加学习，拿下自考本科学历，冲击更高的职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河北石家庄两名新型职业农民获评职称，就是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体现。这两位农民本人，以及我国当下乡村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一直十分关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对于此次又有“新农人”获得职称，他认为这既是对两位农民个人能力的肯定、社会地位的认同，同时也能激发他们进一步学习农业技术的热情，进一步促进农民从“身份”到“职业”的角色转变。同时，评定职称也为乡村人才培养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能带动更多乡村人才学习技术、增长技能，引导激励农民掌握农业生产经营技术，在乡村形成人才汇聚的良性循环。

评定职称，转变的是身份，提高的是效率

近年来，随着获得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越来越多，也有人疑问：为何要给农民评职称？没有高学历，他们靠什么评职称？评了职称有什么用？收入能增加吗？

“给农民评职称与传统意义上的职称评定相比有很多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打破了职称评定的条条框框。”苏华提到，农民职称评定的参评门槛低，对参评人员的专业、论文、科研等不作要求，而注重业绩导向，例如技术水平、业绩贡献、经济社会效益和示范带动作用等，这能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实在在地推动我国农业发展。

农民评职称虽然不重学历、论文，但仍有“门槛”。以全面推开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制度的山东省为例，青岛市对申报农民初级职称的，要求从事相应农业技术工作3年以上，此外还需满足一些附加条件。在临沂市给出的附加条件中，则按照不同农业类别给出了参评标准。但同时，这些“门槛”也可以为“绿色通道”让道。比如，青岛就对业绩显著、贡献突出的部分职业农民提供可“一步到位”的直评机会。

对于已经评上职称的农民，到底能得到啥好处？作为山东第一个开展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试点的城市，东营市对取得职业农民初级、中级职称的个人，分别给予3000元、5000元的一次性补助。除此之外，根据相关规定，获得职业农民职称的人员享有优先安排为科技示范主体；享受国家给予的良种、农机具及资金等方面的扶持；优先享受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享受国家规定的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纳入人才选拔、政府表彰奖励、发展党员、选拔村干部、其他招聘招考等方面的优先对象等权利。

“据我了解，多地出台的职称评定制度均有配套激励机制，如证书激励、物质激励和政策激励，可以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苏华说，以政策激励为例，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职称的人员可优先享受新技术培训，优先承接新品种、新工艺的实验示范等，同时涉农部门各类农业项目、强农惠农奖补政策也将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这也是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有效措施。

“给新型职业农民评‘职称’，我们已配合市农业农村局评选了两批了。第一次是2019年，当时只评选了初级和中级。去年12月份出台新的评价标准后，我们又加评了副高级职称……”济南市人社局专技处处长卢晓丽介绍，如今，越来越多的“田秀才”“土专家”评上了职称，意味着“农民”从一种身份变成一种职业。“从被动承受到主动选择，越来越专业的新型职业农民也将为当地乡

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从“泥腿子”变“新农人”，农业需要更多高素质从业者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农民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可如今，农民所从事的具体事务与传统农民早已大不相同，如机械化种植、乡村旅游、电商农业等，都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正在蓬勃成长。对此，苏华认为，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发展的主要任务、改革的主攻方向都在发生改变。为适应新形势下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必然要求具有与之相适应的高素质现代农业从业者。

“不要小看了新型职业农民评职称，这在推动乡村振兴、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中，有重要意义。”苏华说，一方面，获评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一般是专业大户和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领办人和骨干，可以促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以点带面”，精准发挥职业农民带动效应。另一方面，是对新型职业农民的一种肯定，从国家层面上帮助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把“农民就是个种田的”陈旧观念，转变为“农业也是一个好行当”“干好了同样有出息”的现代观念，把农村青年留住，并吸引更多外部优秀人才回流，鼓励更多人才加入农业生产与经营。

“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是培育‘新农人’的一项重要且有效的制度，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宣传推广。”除此之外，苏华还建议可以在其他方面着力，推动“新农人”的成长成才。比如，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主体作用，实施乡村人才技能培训计划，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业职业经理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鼓励更多农村青年学农务农，不断提升农民队伍整体素质。苏华说，还应充分发挥职业院校的平台作用。职业院校要强化服务“三农”意识，增强人才培养适应性，扩大面向农村招生的规模，通过订单、定向、委托等方式为农村培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带头人和各类技术技能人才。

■快评

让农民这一职业更有吸引力

龙敏飞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不仅是社会各方的呼吁，也是理想型社会的现实呈现。因此，农民职称评定的落地，既是对农民这一职业的肯定，也是“让农民成为更有奔头的职业”的积极探索。

我们期待因此掀起必要的“蝴蝶效应”，更期盼能提高覆盖面，除了在职称评定上有更多肯定、物质激励上有更多倾斜，还要在社会保障上有实质提升。只有从全方位保障入手，才能真正让农民这一职业更有吸引力，才能有更多的人才涌进来，也才能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这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盼望各地能及时跟进，汇聚起推进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5，城市水资源承载力日趋吃紧——

三面环海的大连“喊渴”

吕东浩 吴亦生

三面环海、丘陵多山的大连市，还能缺水？答案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有415立方米，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5，城市水资源承载力日趋吃紧。

得知自己生活在一座严重缺水的城市，全市广大政协委员、党派成员没有等闲视之。不久前，大连市政协召开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就《关于加快提升水资源承载力，支撑和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办理工作进行专题协商。早在今年初召开的市政协全会期间，民盟大连市委、民建大连市委、市政协人资环委就联合提交这一提案，用近4000字的篇幅围绕事关全局、事关长远、事关人民福祉的“水”字说开去。

该提案被市政协确定为“一号提案”，引起各界的极大关注。市委书记胡玉亭专题听取水资源情况汇报，市长陈绍旺专门开会研究部署，责成18家单位合力做好提案办理工作；市政协成立提案办理协商专题调研组，广泛调研、反复研讨，历时半年多形成一份调研报告和29篇建言献策材料。

“当前我市水资源短缺现状与城市发展供水保障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提案主笔人、民盟大连市委专职副主委邓长辉提到，大连发展污水处理事业起步较早，近年来逐步实现由“污水处理”向“再生利用”转变。建议尽快理顺相应机制，制定相关政策，实行排水、再生水一体化改革，确保再生水“应用尽用”。

受自然条件制约，大连现有大中型水库提升库容潜力均不大。政协委员、市政协人资环委主任蒋爱国建议补齐水利短板，提高水库调蓄能力。通过构建联通工程，优化调度配置体系，将过去“点”状分布的水利工程连接成“网”状布局结构，形成一张完整的“大连水网”。

目前，大连市部分供水管网近20年没有进行更新改造，许多旧水表仍在超期服役。着眼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政协委员、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王吉多呼吁加快老旧供水管网更新改造，降低供水系统事故率，减少水库原水消耗量，提升城市品质和民生保障能力。

2016年，大连就已入围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名单。对此，市政协常委、民建大连市委专职副主委金焯指出，海绵城市建设的应有之义是将绿色设施和传统灰色设施有机结合，而不是取而代之。大连海绵城市建设在规划落地、导向指引、排水系统改造、机制体制建立等方面还有诸多提升空间。

“生态补偿机制是坚持以民为本，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质量转化的基础性保障。”政协委员、普兰店区政协主席王继晓提出，生态补偿机制不能仅停留在转移支付的资金补偿上，而需要在各个方面不断加强和完善。

“今年的‘一号提案’从提出到办理，再到此次常委会会议集中协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市政协主席郝宏军强调，要进一步提高站位，立足长远做好“水资源”这篇大文章。下一步，市政协还将聚焦城市水资源承载力问题持续发力，加强协商成果转化和运用，推动水资源协商成果落地落实，切实做好后半篇文章。

红领巾原来诞生在这里

——走进安源，感受薪火相传的“红色血脉”

本报记者 王磊 通讯员 吴兴钟

“红领巾怎么来的？”“背后有哪些红色故事？”……在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第二小学的小学生代表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安源红领巾纪念馆找寻答案。

“这是当年安源儿童团员佩戴过的红飘带，长90厘米，宽6厘米，两头呈三角形，也就是大家佩戴的红领巾的雏形。”孩子们边听着讲解员汤汝妍讲述，边聚拢到这条历经近百年光阴的“红飘带”前，感受薪火相传的“红色血脉”。

“安源儿童团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长期致力于安源红色文化研究的易志文委员介绍，1922年，安源党组织首先将王耀南等7名小矿工组织起来，培养和训练他们，同时定下了3条纪律：保守秘密，不许打架，完成任务。192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少年儿童革命组织——安源童子团正式成立。团员为7到15岁的孩子，胸前佩戴着一条红色的飘带，除学习外，主要承担站岗、放哨、发传单等任务。

如何用好“红领巾诞生地”这一“金字招牌”？萍乡市和安源区政协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上持续作为。

“说起安源，人们会想到‘工人运动发源地’‘秋收起义策源地’，但‘红领巾诞生地’却鲜有人知。”萍乡市政协委员周锋建议，充分用好已建成的全国首个红领巾纪念馆——安源红领巾纪念馆，积极对接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少工委，争取组织和承办一系列全国性的青少年活动，提高安源在全国青少年心目中的影响力，建成全国性青少年精神家园。

“将加强安源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和利用作为对口协商议题。”安源区政协副主席林建梅介绍，年初，区政协积极响应市委“五区”建设和区委“三区同振、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将红色基因传承创新区建设列为年度重点工作。

“安源是一片红色热土，孕育出的‘安源精神’是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在“加强安源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和利用”专题协商座谈会上，易志文建议用好活安源红色文化资源，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100周年、中国少年儿童运动100周年为契机，深入挖掘安源精神内涵，着力加快红色基因传承创新区建设。

“目前有保存完整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2处。”林建梅希望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这些革命文物，加大革命文物价值的挖掘研究，让更多人了解萍乡工运史、红领巾诞生史，了解安源、关注安源。

一纪转瞬，“世博与我”的故事仍在被这座城市讲述

本报记者 顾意亮

“伟大的时代成就伟大的事业，作为上海世博会这一伟大事件的见证者、受益人，我们要继续弘扬世博精神，不断前行。”在近日举行的《世博与我》出版座谈会暨赠书仪式上，该书主编、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原中国政府驻国际展览局代表周汉民如是感慨。

2022年有两个时间特征与上海世博会有关：2022年12月3日，国际展览局投票

决定2010年世博会在中国上海举行，今年12月3日是中国申博成功20周年；2010年是虎年，今年是上海世博会之后的第一个虎年，一纪转瞬。

《世博与我》缘起2021年11月初，原世博局部分同事相聚时的一个提议，最终呈现的是从个人视角所撰写的回忆上海世博会和传承上海世博会精神的征文集合。

80多位作者，或曾亲历上海世博会，

或仍在从事世博延续至今的相关工作，从申博一线的外交官到普通的志愿者，每一位都贡献了一份自己对世博的鲜活记忆与情感。

这些文章的时间跨度近40年，从20世纪80年代初汪道涵对举办世博会的考虑，到今天浦江两岸世博园区的开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世博会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积极影响，以及这个项目的艰辛历程。

书中讲述着一个故事，书的本身也是

一个故事。在一次编委会会议上，周汉民认为，应该要有怀念已故老领导的文章，他自己撰写了有关上海市原市长杨雄、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参与世博会的回忆文章。随后，编委会取得杨雄夫人沈佩琪授权，将杨雄在2020年关于世博会的一次讲话，作为《世博与我》的序言。

2010年上海世博会高峰论坛通过的《上海宣言》，倡议将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闭幕之日定为“世界城市日”，让上海世博会的理念与实践得以永续，激励人类为城市创新与和谐发展而不懈追求和奋斗。时至今日，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和上海世博会精神对城市建设、管理乃至每一个人的生活仍影响深刻。

“世博与我”的故事将一直被这座城市讲述着、传承着、追慕着……